

数字资本主义对自由时间的侵蚀困境及其正义重构

王晓广 丁 慧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80)

摘 要:数字资本主义的兴起带来了自由时间的系统性异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框架的运用,将深入揭示资本逻辑通过数字化技术对自由时间的隐蔽剥削机制。数字资本主义通过平台成瘾机制、消费捆绑策略和劳动伪装形式,将自由时间变为剩余价值生产的新场域,呈现出时间结构碎片化、时间节奏加速与时间感知扭曲的三重特征。数字资本主义的算法控制突破传统时空界限,将劳动再生产过程纳入价值增殖体系,形成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剥削的叠加形态,导致劳动者在生物节律与精神活动层面的双重异化。突破这一困境,实现时间主权的解放,必须在制度层面建立劳动时间规约和算法透明审查,在技术层面发展以人为本导向的数字基础设施,在文化层面构筑尊重生命节奏的价值评价体系。

关键词:数字资本主义;自由时间;时间异化;时间侵蚀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科学内涵和实践路径研究”(23&ZD007)。

千古称颂的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描绘出我国古代知识分子自在闲适的理想境界,其中蕴含着古人诗意的田园叙事,在农耕时序中升腾出追求自由时间的审美自觉,超越了生存必需的时间维度,承载着人类对自由本质的诗意追寻与精神超越。步入现代社会,数字技术深度介入日常生活的当下,深刻重塑了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拓展了个体自由时间的可能性。消费领域的智能推送、即时物流等技术突破时空限制,显著提升人们的生活品质;生产领域通过物联网、人工智能重构劳动组织,为弱势群体创造平等参与机会;大数据算法优化认知效率,实现更多时间的休闲。但数字化的技术中立性需要结合社会制度考察,在此背景下中国通过《数据安全法》等制度设计及“东数西算”战略,来消解数字鸿沟同时规制资本异化,为全球数字文明提供兼顾效率与公平的新范式。而在全球化深入的过程中,资本逻辑悄然融入数字技术的扩张中,由此催生了资本主义新样态“数字资本主义”。数字资本主义以更隐秘的方式重塑着经济

作者简介:王晓广,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丁慧,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形态和生活方式,传统工业模式正加速向数据驱动的形态变革,数字化看似赋予人们更灵活的时间支配权,扩充了人们的休闲选择,实则将人们的生活场域转化为持续生成价值的数字界面。通过塑造数字图景将人际交往、消费行为甚至思维习惯转化为可计算的数据流量,资本逻辑下进行数字化的算法操控与数据捕获,将个体的自由时间系统性地重构为流量资本的生产要素,自由时间无形中成为未被偿付的剩余价值参与到资本增殖的过程中。研究数字资本主义下自由时间的异化与重构,不仅关乎马克思“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1]532}和“发展的空间”^{[1]532}命题的当代验证,更揭示了数字资本主义剥削机制的范式转换,为捍卫数字时代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批判性坐标,从而推动扩大个人自由选择的空间,更好地体现数字经济对社会公平的促进作用。

一、数字资本主义对自由时间的侵蚀困境与特征

马克思指出,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2]53},数字化让人们具备一定突破时空限制和认知解放的能力,放大了人的本质力量。数字技术的中立属性并非侵蚀自由时间的本质动因,关键在于资本逻辑借助技术架构重构社会关系网络,使人类自由时间异化为可监控、可榨取的数据生产资料,当算法系统演变为资本积累的精密装置,技术便具备剥削时间的工具属性。这一过程深刻揭示了技术工具的价值取向取决于其所嵌入的生产关系,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此获得了数字化阐释,传统剩余价值榨取模式升级为对自由时间的侵蚀,这种侵蚀源于资本逻辑和自由时间本质的结构性矛盾,数字技术构筑了多重隐蔽剥削机制,其深层症候的多种表现,导致主体丧失对时间本真性的历史把握。

(一)自由时间的概念与资本逻辑的矛盾

本文所探讨的自由时间为非劳动时间,即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的时间内人类用以休息和发展自我的时间,自由时间是个体生命价值的深刻体现,更是现代社会人们构建美好生活实现自我完善与超越的关键维度。在马克思理论视野中,“自由时间”一是指“用于娱乐和休息的余暇时间”^{[3]317};二是指发展智力,在精神上掌握自由的时间,是“非劳动时间”^{[3]349}和“不被生产劳动所吸收的时间”,包括“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履行社会职能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的时间,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3]306}。可见在马克思的认识中,自由时间并不仅仅指这一时间脱离了劳动,而是在这时间内超越了简单的休憩与放松,让人们在其中得以自由地活动、深刻地思考、广泛地创造,从而不断充实和完善自我。

自由时间的本质是人类摆脱物质束缚、追求精神自由和全面发展的核心场域。马克思指出,真正的财富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4]200},衡量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4]200}。在此意义上自由时间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是时间的权利属性,人要挣脱资本对时间的枷锁来自主安排生命的节奏,否则人将被剥夺为人的权利,“使人沦为牲口”^[5],

另一方面是时间的伦理属性,在消灭私有制后劳动不仅是出卖自己时间谋生的手段,而是升华为“生活的第一需要”^[6],自由时间成为创造科学,艺术创作和自我实现的空间。在个体层面自由时间的价值体现为体力恢复的休闲时间,同时在更高层级自由时间应是自我反思、知识探索和创造力释放的载体,使个体超越异化劳动,在自由活动中确证生命的意义。在社会发展层面自由时间的价值在于促进人类的积极活动,从而推动社会财富积累和生产力的革新,为人类社会发展提高物质基础。在文明演进层面自由时间将重构劳动和生活的辩证关系,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将实现辩证统一,让人的时间主权摆脱资本逻辑的桎梏,实现“人的积极存在”^{[1]532}和“类本质”的复归。

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时间是马克思对劳动过程分析的核心,揭示了资本增殖的本质,即对无产阶级时间的剥夺和异化。在传统工业扩张中,劳动者被迫将生命时间分割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被资本家无偿占有转化为利润,这一异化过程不仅体现在劳动产品对劳动者的统治,还把异化渗透至劳动过程之中,机械化的生产把人的主体性降格为生产机器的附属物,自由自觉的劳动异化成为劳动者维持生存的手段。劳动者与自身类本质、其他劳动者和社会关系的普遍异化中,“时间异化”构成了核心症候,时间成为资本增殖的工具,致使人类失去了对自身生命时间自由自觉的掌控。自由时间本质和资本增殖两者逻辑的根本性矛盾,根植于对时间属性界定和利用的不同。资本逻辑强行将个体的时间抽象化,忽略了时间作为个体生命体验的独特性,将人类时间压缩为可计算和分割的价值生产单元。在数字资本主义下,资本对于自由时间的规训更为隐秘,资本增殖系统性地瓦解了自由时间的解放潜能。

(二)数字资本主义对自由时间侵蚀的表现

在全球数字化浪潮的挟卷之下,数字资本主义对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极为普遍,数字技术对时间控制能力不断强化,在这一进程下人们的休闲娱乐理念被资本以更隐蔽的方式所重构,暴露了资本在数字时代对个体生活领域的深层殖民。各类社交媒体作为数字资本主义典型的平台装置,通过算法霸权和行为诱导,实现了对自由时间的碎片化捕获。各类短视频平台通过算法精准投送,呈现时长短、传播快和易切换的内容,来诱导用户沉浸式投入,并通过监测用户眼球停留时间、手指滑动频率等微数据,进行推送策略的调整,使个体陷入信息流中不能自拔,深度思考正被短视频的15秒逻辑不断冲击。社交媒体等平台背后的机制是对马克思“抽象劳动时间”概念的数字化延伸,把用户的注意力时长量化为可计价的单位,成为平台攫取利润的关键所在,而用户在这一机制下认知的连续性特征被瓦解,自由时间被切割为信息消费单元,思维模式被迫适应短时刺激和快速切换的节奏,从而使得深度思考能力被即时快感取代。“在时间中人的本质和意义得到澄明,因为人的本质是生成性的,在时间中不断延展、丰富和显现。”^[7]而数字资本主义下社交媒体对自由时间的侵袭让主体陷入了虚假性的即时性体验,陷入了“伪循环时间”的幻觉。

虚拟消费的兴起是数字资本主义对自由时间侵蚀的新表现,如吸引用户充值的网络游戏

通过充分调研大众心理来建立游戏过程中的成就系统,使得大众可以从数字化游戏体验中获取快感,从而沉迷于游戏平台打造的沉浸式设计。通过限时活动和抽奖奖励,激活游戏玩家的多巴胺能神经元,并且设计丰富多彩信息过载的界面和社交策略,使得玩家注意力被不断消耗,自制力缺乏,出现时间感知扭曲,导致本应休憩的自由时间被转化为资本平台的利润。数字内容付费模式通过内容会员订阅与独家内容的策略,来对用户认知路径形成隐形控制,把用户用于自我提升的时间垄断于平台之中。平台通过营销性话语制造用户的认知焦虑,迫使自由时间服务于“终身学习”的资本叙事,部分平台通过解构系统化的知识形成碎片化的知识投喂,快速消费的信息快餐使用户产生学习充实的错觉,用户的使用过程依从平台的营销策略被不断转化为平台数据,内容消费从商业范畴的价值交换转变为平台对用户的时间质押,使得用户的时间主权在数字资本主义下不断让渡。通过数字化监控平台将用户的时间和注意力数据变成平台衡量用户活跃度的指标,并将这些数据变为平台向广告商进行兜售的筹码,从而谋取利润。同时当数字平台不断充斥文化消费渠道时,实体书店、独立影院等传统文化空间被不断挤压,自由时间的文化实践被压缩为电子屏幕前的单向度消费,文化产品在数字化复制中不断分割为即时获取的数字流量,从而愈发导致文化生态的单一化。

数字资本主义通过众包工作和用户生成内容两种更为隐蔽的机制将自由时间转换为对大众剥削的场域。众包模式主要以自愿参与的形式来吸引大众通过平台参与碎片化的任务(如数据标注、即时配送等劳动形式),参与过程中工作者往往认为通过平台自由时间可以变为灵活创收的机会,实际上却陷入各平台提供的薪酬低、强度高的劳动陷阱。平台通过算法将劳动任务解构为单个的任务单元,模糊了劳动在时间维度的边界,在零工经济的框架下形成了隐蔽的剥削机制,发布微小任务把劳动过程嵌入自由时间范畴内,通过碎片化任务的分解,弱化劳动者对劳动强度的主体认知。劳动者在平台规则引导下完成的内容创作、数据生产等劳动成果被无偿占有,平台充当劳动工具又成为被资本控制的劳动者的精神牢笼。同时平台构建话语体系将资本增殖的过程描述为共享经济红利,实现对劳动者剩余价值攫取的遮蔽,导致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制度性缺位,从而引发劳动者自由时间丧失的劳动异化。

用户生成内容(UGC)即 User-Created Content 是由原来以用户下载为主的网络使用方式,转变为用户下载和上传并重。UGC 模式通过“创意劳动”和“流量经济”的结合构建起将创作者的自由时间转变为平台利润的形式,创作者在社交平台上传文字、图像、视频等内容时,看似行使自我表达的权利,然而却被卷入数字资本主义的循环中。平台通过算法来激励如点赞回报、流量分成等形式诱导用户持续投入创作时间,但通过知识产权垄断和算法的规训剥夺用户劳动成果的支配,创作者无法掌控内容的传播边界,更难以获得与数据价值匹配的经济收益。在平台进行资本增殖的过程中,创作者被流量驱使沦为平台的内容生产机器,其创意劳动被压缩为流量变现的原材料,当用户为追求社交认同而沉迷内容生产时,自由时间中表面自主的创作行为,实质是资本增殖所需的免费数字劳动,在这一剥削机制中同样具有劳动异化效应。

(三)数字资本主义对自由时间侵蚀的特征

数字资本主义通过平台成瘾、消费捆绑与劳动伪装的复合作用,使自由时间呈现碎片化、虚拟化与受控性特征,其核心侵蚀机制可归纳为时间结构重构、时间节奏加速与时间感知扭曲三重维度。这一过程既折射出资本逻辑对生命时间的全面殖民,也揭示了技术理性对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层异化。

数字资本主义对自由时间的侵蚀表现出重塑时间结构的特征。传统社会运行中时间秩序根植于自然节律,遵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节奏,劳动和休闲的边界具有模糊的分界线,尽管物质条件有所匮乏,但是人们能够有充足的时间进行个人精神丰富的探索和家庭亲友间紧密的互动,形成了基于自然节奏的传统智慧(如中国的二十四节气)。随着资本现代性的发展,传统时间秩序逐步被打破甚至颠覆,在工业化和数字化的进程中,时间被量化为主要的生产要素,现代时间管理中的考勤制度和算法监控来分割时间,时间由此被异化为线性单元,彻底服务于生产秩序,自由时间被不断压缩和侵占。个体陷入自由时间商品化的困境中,现代标准化的作业流程充分激发人的工作效率,并把自由时间的价值简化为资本增殖的重要场域,而本应包含在其中的文化意义和情感价值被数字资本主义不断消解。马尔库塞尖锐地指出,在发达工业社会技术异化现象不仅剥夺了人的主体性,而且会使人们逐渐丧失批判精神和创造力^[8],当时间管理工具精确到分钟时,传统时间结构被数字资本主义割裂,人类便沦为马尔库塞笔下的“单向度存在”,在资本设定的效率轨道上机械重复,以效率提升为名将生命分解为可计算单位,时间的挤占被消费主义包装为自我提升的途径,人们渐渐丧失对时间本真性的感知能力,丧失了反思生命本质和超越现实的能力。

数字资本主义对自由时间的侵蚀催化了时间加速的恶性循环。交通方式、通信技术和产业升级的迭代速度不断加快,社会发展从技术层面扩展至社会交往、文化交流等层面,整体社会效率的提升使得人们生活节奏不断加快。作为资本逻辑扩张的重要场域,自由时间内延续了整体社会氛围加速的节奏,劳动领域的时间压力渗透至日常生活,自由时间在数字资本主义下被不断异化,资本增殖的无限性要求转化为社会生产对效率的绝对崇拜,进而塑造了人们对时间的畸形心理,“时间的稀缺性带来的约束与心理压力几乎成为当今社会人们获得自由的最大障碍。结果就算自由时间真的增加了,人们还是会感觉生活得更加匆忙”^[9]。通讯工具的延伸让劳动者在自由时间内依然处于全天候工作的焦虑中。各类数字平台创造的即时满足系统表面上优化了时间效率,然而却进入了罗萨所批判的时间加速悖论中^[10],技术所节省的时间被资本转化为新的剥削场域,加速逻辑使得自由时间从“存在的展开空间”^{[1]532}异化为“资本逻辑增殖的生产时间”^{[1]546},在这过程中个体在加速节奏中将自我客体化,不断陷入时间焦虑和精神空虚中。

数字资本主义对自由时间侵蚀更深层次的特征为时间感知扭曲。在康德哲学中时间是一种先验直观的形式^[11],而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冲击下已发生畸变。自由时间段内被不断接收的社交媒体推送、新闻热点更新和购物平台弹窗等冗余信息将时间变为碎片化,让人陷入吉登斯所

分析的“脱域”状态^[12],即物理时间的连续性被碎片化的信息所分解。而自由时间和劳动时间界限愈来愈模糊让这一状态更加明显,工作所用的通信软件长时间在线和及时回复的要求让自由时间也不能脱离劳动,逐步让人们对时间的感知失序。在数字资本主义不断扩充到消费端,通过一系列措施来强化人们的即时满足机制(如在线直播购物、视频倍速播放),自由时间中自我需求的实现阈值被不断拉高,人们逐步丧失对时间本质的敬畏和对时间本真性的感知能力,成为数字资本主义中时间殖民体系的受害者。

二、自由时间侵蚀困境的马克思主义批判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其深邃的历史唯物主义视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展开系统解构,从商品入手揭示劳动力成为特殊商品的秘密,通过劳动二重性理论揭示价值形成的本质,并创立剩余价值学说,指出资本家通过占有无偿劳动实现价值增殖的内在机制,通过对生产过程的分析证明利润、利息、地租均源自对活劳动的剥削。数字技术本应兑现马克思提出的通过缩短工作日实现人类体力和智力的充分自由发展,但数字资本主义对自由时间的系统性掠夺成为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在 21 世纪最鲜明的当代印证。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在此显现新形态,通过分析数字资本主义中剩余价值剥削的时空延展、再生产劳动中对时间的隐形剥夺和在数字劳动中生命时间的异化,为人们指明夺回时间主权的斗争方向。

(一) 数字资本主义中剩余价值剥削的时空延展

在数字资本主义的演进中,资本增殖的逻辑通过技术形态的革新获得了更加隐蔽和彻底的实现方式。在对资本进行分析时,马克思谈到“资本只有一种生活本能,这就是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3]269},随着新的生产方式的展开,在算法加持下生产突破了传统劳动时间的物质边界,将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掌握得更为精确。在互联网经济中平台通过实时数据追踪和云端协作,把劳动者的生理时间切割为可计量的劳动单元,使得工作日的物理界限在数字空间的无限延展中被不断突破。时间被精细化控制的实质是资本对活劳动进行原子化控制,劳动过程被分解为精细的时间单位,资本实现了对劳动者生命时间的多方位渗透。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把工作日延长到超过一切自然界限”^{[2]442}的本性,在算法技术的支撑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合法性。

数字资本主义侵蚀时间的深化体现为劳动时间的绝对延长,更表现为对自由时间的价值的颠覆。马克思强调:“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13]225-226}然而在数字平台构建的虚拟场域中,劳动者的自由时间被拓展为潜在的剩余价值生产空间,如社交媒体中的互动行为、零工经济中的待命状态,甚至包含了睡眠周期中的生物数据采集,都被资本纳入其数据提取网络中。对自由时间的侵袭深刻印证了马克思关于资本逻辑的深刻论断“像狼一般”^{[2]175}“侵占人体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2]295}当劳动者在数字空间中的任何行为都成为可被量化的生产要素时,资本完成了

对人类生命时间的彻底商品化。由于数字技术的发展,资本对时空界限的突破重构了绝对剩余价值的剥削形式,通过数字化与全球化的结合推动了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全球化攫取。马克思指出:“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13]16} 网络在全球生产中的延展可以建立远程协作系统,从而将分散的地理时间纳入统一的价值增殖体系,打破时区差异,构建起不间断的数字劳动链,实现了资本所追求的“对资本来说是极其必要的:用时间去消灭空间”^{[13]16}。资本通过提高全球劳动生产力的协同效率,在更广阔的维度上实现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来降低劳动力价值的目标,从而进行相对剩余价值规律的当代演绎。

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支配权力在数字系统中获得了新形态,同时数字技术放大了资本对于剩余价值的掠夺,“信息数据资源具有明显的物质属性,信息数据背后是人及其物质活动的反映,不能因其存在形态的虚拟性而否认其物质性”^[14]。马克思揭示“在机器体系中,对象化劳动在物质上与活劳动相对立而成为支配活劳动的力量”^{[4]186},数字网络承载了资本意志,继承并强化了传统工业中的支配关系。生产之外的自由时间也并没有逃脱这一逻辑,劳动者必须使自身的生物节奏服从资本算法的实时调控,活劳动的能动性被压缩为对数字指令的被动响应,并且这一支配不仅发生在生产领域,更通过移动终端渗透到劳动者的日常生活,使得“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15]扩展到人类存在的每个时间片段。

(二)数字资本主义中再生产劳动的隐形剥夺

在数字资本主义的架构下资本对于劳动力再生产领域的渗透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隐蔽性和系统性。马克思曾指出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占有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2]194},这一论断在数字时代获得了新的历史确证,平台经济中在线培训、技能更新的时间成本被转嫁给劳动者自身时,资本完成了对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深度控制。劳动者为恢复劳动力所需的自由时间不再属于私人领域,而是被纳入资本的价值增殖链之中,本应属于劳动力自我修复的活动被重构为“自我再生产劳动”的私有化实践。劳动者为维持自身生存所耗费的时间与精力,“都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2]628},而资本通过将劳动力维护时间转化为可变资本的节省,实现了对剩余价值的二次攫取。

再生产劳动环节对自由时间的侵蚀渗透至个体生活的各个环节。数字资本主义将个体的居所转化为剩余价值生产的延伸场域,使得马克思揭示的“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变成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2]447}。的困境达到新的强度。居家办公模式模糊了劳动和休闲的物理界限,在本应享受个体私人生活和家庭生活的情况下,仍然要处于工作状态,这种时空重叠的现象并非技术进步带来的福祉,而是资本对劳动力再生产过程的全面介入。当私人空间被改造成剩余价值衍生的重要场所,劳动者本应休憩和恢复的日常活动便异化为资本积累的要素,马克思笔下“人的生命时间”^{[3]306}彻底沦为价值增殖的原料。数字资本主义对自由时间侵蚀的升级印证了《资本论》中的核心判断,资本的本质在于将人类的一切活动都转化为生产剩余价值的材料,即便是维持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也不例外。

数字资本主义打造出“自由”的假命题成为深化异化的意识形态工具。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异化”使“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16],异化在数字资本主义中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平台经济以解放劳动者为名看似给予了劳动者更多的“自由时间”,如使个体在算法中“自由”选择工作时间,自媒体博主在流量裹挟中“自愿”选择创作时长,而这些自由本质上是资本摆脱固定工作制约束的策略性伪装,正如马克思揭示的“在自由竞争情况下,自由的并不是个人,而是资本”^{[13]159}。当劳动者误将被迫的弹性化生存视为主体性的彰显时,异化劳动便完成了对自由时间的侵蚀和对其意识结构的深层控制。

数字资本主义对再生产劳动的剥夺最终指向社会关系的全面物化。马克思所剖析的“商品拜物教”,在算法中介入人际交往后演化为“数据拜物教”的新形态,劳动者自由时间内的社交被平台重组为数据生产的原料,人际关系沦为算法优化的参数,背离了“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17]的命题。人的社会关系被抽象为可计算、可交易的数据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可以说是颠倒地表现出来,“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2]90},人的主体性湮没于被数字资本主义所掌握的算法推送中,紧密的亲友关系所包含的情感纽带在数字化互动中也会被一定程度地消解。可见物化不仅发生在经济领域,更渗透到自由时间内情感与精神生活发展的每个角落。资本对再生产领域的改造,本质上是将马克思揭示的“劳动力商品化”逻辑推向自由时间内更彻底的阶段。在传统工业资本主义中,劳动者尚能通过工会斗争争取工作日的界限,通过消费活动获得有限的劳动力修复。但在数字资本主义架构下时空区隔被彻底打破。对自由时间的全面商品化,使得马克思批判的“个人消费,在一定限度内,也不过是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2]629}的机制,发展到将人的生物节律与精神活动都纳入数字网络之中。数字资本主义对再生产劳动的隐形剥夺,不过是资本逻辑在新技术条件下的必然延伸,印证了资本的本质在于无止境的价值增殖,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始终是对人类生命时间的掠夺。

(三)数字资本主义中生命时间的全面异化

在数字资本主义的架构下,算法系统的全面渗透不仅重构了资本与劳动的支配关系,更将马克思揭示的异化逻辑延伸至人类生命时间的深层维度。在传统工业时代,资本追逐利润使机器生产突破了“习俗和自然、年龄和性别、昼和夜的界限,统统被摧毁了。甚至旧法规中按农民的习惯规定的关于昼夜的简单概念,也变得如此模糊不清”^{[3]320},在数字时代劳动者的生活节律被迫和算法调控同步,生命经验被转化为实时更新的数据流。马克思批判的异化理论在数字时代时间维度下展现出更彻底的实现形态,算法作为对象化劳动的形态,通过将人类活动转化为可计算的时间单元,完成了对自由时间的侵蚀,资本挟制技术利用精确到秒的时间规范,劳动者的生命过程被降格为资本增殖的时间变量。

劳动过程的抽象化统治在此呈现为时间异化的核心机制。资本通过占有劳动时间实现价值增殖的逻辑,在数字化时代已演变为对自由时间的整体性侵蚀,通过数字机制的全方位包围

资本完成了对个体时间的抽象化统治。自由时间的异化导致了主体性建构的瓦解,马克思强调的“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1]532}在数字资本主义中被不断颠覆。自由时间被侵蚀催生了新型的物化意识,数字资本主义通过追求效率的快节奏将其内化为个体自我规训的时间准则,让劳动者不断追求响应速度,并把这项要求认为是工作效率的体现,把平台承接的任务密度美化为个体选择的证明,从而主动配合自由时间的商品化。这一思维背后的深层机理在于资本通过算法重构了人类的时间感知方式,马克思揭示的“死劳动支配活劳动”显现为“算法时间支配自由时间”的升级。

数字资本主义的时间统治更通过物化意识的再生产巩固其权力结构。平台经济创造的“时间自主性”幻象,恰恰成为强化剥削效率的意识形态工具。马克思揭示的物化逻辑在此展现新形态:时间规训伪装为自我优化的技术手段,时间剥削被表征为能力提升的成长路径。资本通过将时间异化转化为个体参与式的自我剥削,成功遮蔽了剩余价值榨取的实质。时间异化的深层动力源于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根本矛盾,数字技术的革命性潜力和资本增殖的结构性冲突,本应解放人类时间的智能系统,反而成为禁锢生命时间的数字化牢笼,“资本所主导的算法实现了对人民闲暇时间的殖民化,对消遣娱乐、人际关系乃至个体本身的整体商业化”^[18]。算法对时间效率的无限追求,暴露出资本积累的时空矛盾已到达全新维度。突破时间异化的可能性存在于数字技术的社会化重构中,马克思关于“自由时间是人类发展空间”^{[1]532}的论断,在数字时代获得新的实践意义,将时间异化问题提升为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核心议题,回归技术发展服务于人类生命时间丰富性与多样性的解放意义。

三、重构数字资本主义时间主权的解放路径

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全面侵蚀下,自由时间的解放已从理论命题转化为迫切的实践需求。马克思关于自由时间是发展人类才能的空间的论断,揭示了时间主权与人的解放之间的本质关联。“正义意味着与社会理想的符合。”^[19]面对算法殖民对生命时间的系统性掠夺,重构数字正义的核心在于将自由时间从资本逻辑中剥离,重建其作为人类创造性实践载体的本质属性。这一解放路径需从制度约束、技术革新和价值重构三重维度协同推进,形成对抗时间异化的系统性方案。

(一)制度层面:劳动时间规约与数字权利立法

制度将多维度、系统性塑造和约束着社会中的个体与组织的行为。在数字管理中所有的数字技术问题在治理维度都可以“化约”为数据治理(含信息保护)、算法治理和平台治理三个维度^[20]。首先应保障公民充足充分的自由时间时长,通过立法手段规范用人单位工时制度,明确限定加班时长上限,从而确保劳动者享有充足的自由支配时间,为社会成员实现个体全面发展创造必要条件。同时资本对自由时间的侵占还体现为劳动时间与自由时间的边界消解,马克思所

指出的“工作日界限的争夺战”^{[2]258},在数字时代演变为对时间主权的全面争夺。通过网络化建立的即时通讯工具和远程办公系统,资本对生命时间的绝对占有从工厂车间扩展至私人领域,因此要构建时间管理的法律框架,从而建立捍卫自由时间的制度基石。通过强制规定在非工作时段工作内容不得以通信工具侵扰劳动者,能够有效重建劳动与生活的物理边界,将时间主权重归劳动者,本质上是对抗资本无限延长剩余劳动时间的阶级斗争新形态。法律需进一步明确数字通信工具关于工作使用的时空范围,将平台算法的调度权限限制在合同约定的劳动时长内。

建立算法透明化审查是防止自由时间被侵蚀的技术前提。资本平台通过算法的黑箱运作操纵自由时间,成为资本掩盖时间侵蚀的工具。因此要建立第三方算法审计制度,强制公开影响劳动者时间分配的核心参数,从而暴露资本通过时间碎片化榨取剩余价值的隐蔽路径。当人们可追溯算法如何将个人的自由间隙转化为零工时间和消费数据,便能识破“时间自主性”的虚假叙事。政府还应推动建立数据收益共享制度,劳动者因自身数据活动在平台中获得的数据增值,应使相应平台按比例返还为时间补偿或经济收益。

数字时代劳动形态的结构性变革要求建立更适配新劳动形态的报酬反馈和保护机制。要透视数字时代价值生产规律的深层逻辑,随着平台算法对劳动过程的解构与重组,劳动者在非连续工作时间中创造的边际价值持续攀升,劳动报酬与自由时间的边界呈现流动性特征,传统8小时工作制在零工经济中已失效,自由时间内产生的劳动报酬占比不断增加,因此需要创造适应数字劳动特征的弹性保护框架,构建新型劳动保护框架建立时更为科学的价值计量体系,将马克思“必要劳动时间”理论转化为数字时代的调控工具,通过压缩资本对自由时间的侵占空间,为劳动者的精神再生产创造制度保障。

(二)技术层面:实现以人为本导向技术设计

“技术是负载着价值,它重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可能行动方式。”^[21]数字技术深度介入人们生活工作的各个过程,重建以人为本的技术发展路径已成为保护时间权益的关键突破口。技术革新不仅关乎工具效能的提升,还包含重新掌控自身生命节奏的文明抗争,要实现通过技术解放人类的时间主权,需要穿透技术中立性的表象,在算法系统的底层逻辑中植入人文价值,使技术进步真正服务于人的自由发展而非资本的时间掠夺。技术发展的方向选择始终映射着社会权力的博弈格局,宣称技术中立的论调实质上是将资本意志伪装成技术必然性的障眼法,在庞大的数字网络中算法技术通过各种手段将人的自由时间转化为利润,提出的各种技术方案成为资本增殖逻辑的数字化变身,将工厂时代的工时压榨转化为数字时代精密计算的时间侵蚀。打破时间的异化趋势,就要重新定义技术研发的价值坐标,不能只是在技术层面追求无限压缩人类劳动时间的“效率神话”,而应该探索如何通过技术创新拓展人的自主发展空间。

公共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是破解平台垄断自由时间的重要途径。当前人们被迫在资本控制的应用程序中谋生,技术依附性导致人们的时间安排必然受制于平台规则。只有建立开放共享的数字劳动平台,数字系统中流量的推送不再由资本单方面决定,而应该根据大众福祉的实

际情况动态调整,算法的参数设置应通过民主协商,确保技术规则服务于人的真实需求而非利润最大化。这种变革本质上是对传统生产关系的数字化重构,让劳动主体在自由时间享用的技术层面获得与资本对话的平等地位。

人与技术关系的重新定义要指向更深层的技术哲学变革,深入挖掘技术系统的人本属性。技术的发展立足于调节工作强度与休息节奏的平衡,明确技术发展民主化的价值导向。要清醒认识到算法系统的伦理属性取决于开发者的价值立场,因此要通过制度设计引导技术发展方向,人民群众对技术系统的掌控能力才是决定人民福祉的关键因素,“当公众具备识别算法偏见、维护数据隐私、参与数字治理的意识时,才能推动规则设计向公平方向演进”^[22]。只有在技术系统中注入更强的人文自觉,让技术学会尊重人类对自由时间的需求,让技术的使用者在数字文明时代对自身主体性的重新确认,才能让技术发展走出资本主导的单一叙事。

(三)文化层面:重塑时间自主性的价值认知

“正如在现实的历史进程中自发的资本力量无法完成自我否定一样,数字资本主义导致的问题必须通过一定历史主体的自觉历史活动才能解决。”^[23]破解数字资本主义对自由时间的侵蚀需要重塑社会对时间的集体认知,构建一种尊重生命节奏、激发创造潜能的文化生态。在数字时代重塑社会时间文化,需要穿透资本编织的效率神话,在文化心理层面重建健康的时间价值观,使社会成员摆脱“加速循环”的精神奴役,充分享用自由时间的价值,重新获得感知生命节奏的主体能力。

资本对时间的隐秘控制往往始于文化层面的意识塑造,通过构筑文化符号来塑造新型劳动伦理体系,巧妙地将资本的时间压榨转化为个人价值实现,使人在追求职业成就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出让时间主权。同时自由时间深层异化在于,社交媒体创造的即时互动不断强化网络在场的生存状态,平台内容被认为是评估生活充实度、人生价值意义的重要场所。这种时间文化的扭曲发展使得人类逐渐丧失独处与沉思的能力,解构这种异化时间文化需要重塑社会评价体系入手。塑造“慢生活”的理念挑战数字资本主义塑造的效率至上的虚假观念,打破资本垄断时间的解释权。公共媒体需要构建新的叙事框架,将从容思考的时间成本转化为精神财富,把碎片化生存的焦虑转化为集体拥有自觉自由时间的动力,塑造共享的文化时间框架,将“为生命个体之间的互动与共享营造社会语境,为增进当代社会认同提供了重要契机”^[24]。

数字资本主义中时间规训的核心是训练人们将生命分割为可计量的效率单元,打破这种驯化机制,就要建立批判性的时间素养教育,培养人们解构时间侵蚀的思维能力,洞察数字网络怎样制造持续焦虑,重建人类对时间的本体感知。整个社会要创造共享的自由时间文化资源库,培育抵抗即时消费主义的精神免疫力,使自由时间真正成为全体社会成员的发展资本。在社区层面重建时间文化生态,创造集体性的时间实践场景(如社区图书馆的纸质阅读、公园里的线下漫步),在资本的时间网格中创造算法之外的时空体验。当越来越多的人在这些场景中重新获得心灵的宁静与思维的深度,资本精心营造的“加速文化”就会失去精神控制的支点。

重建自由时间的文化维度,要颠覆“时间即金钱”的单一价值尺度,破解数字资本主义的渗透,让社会承认沉思、休憩、漫游等自由时间的独立价值,将其视为培育人性完整的必需养分。正如马克思所述,自由时间才是“衡量财富的真正尺度”^{[13]222},不仅是物质财富,更是精神自由的积累。

四、结语

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将人类原本用于沉思与创造的自由时光,悄然转化为资本扩张的隐形领域。从陶渊明笔下“悠然见南山”的闲适境界,到如今被算法切割成碎片的数据单元,个体生命中最具价值的自由维度,正在被资本以精密的数据化手段重构。当数字平台将每一次点击、每一次停留都折算为流量收益时,马克思提出的“时间是人的发展空间”这一命题,在当代呈现出另一幅现实图景,技术本应赋予的解放性力量,反而成为资本渗透私人生活的触手,使得剩余价值的榨取从工厂流水线延伸至数据爬取的每个角落。

问题的反思同时意味着改变的可能,要扭转时间主权的沦陷,需要从多维度构建新的抵抗体系。只有当自由时间挣脱资本增殖的锁链,重新成为培育创造力与人文精神的土壤,马克思笔下“自由时间即财富”的理想才可能照进现实。时间主权的回归不仅涉及制度与技术的革新,更要求整个文明对社会发展逻辑进行深刻反思,在数字洪流中需要找到平衡点,让技术回归人的价值实现,使人类重获时间中的从容,让被算法肢解的时间碎片重新拼合成完整的人生图景。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3.
- [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23.
- [7] 张晓兰.数字化时代“时间悖论”与人的自由发展——基于马克思自由时间思想的考察[J].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4(4):52-63.
- [8]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205.
- [9] 周海荣.资本逻辑与休闲异化[J].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18(1):261-273.
- [10] 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M].郑作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21.
- [11]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4.
- [12] 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18.
-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 [14] 苏鹏.数字劳动异化的内涵、形态与超越[J].重庆社会科学,2025(5):76-85.
-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6.
- [1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56.
-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5.
- [18] 福克斯,莫斯科.马克思归来(上)[M].“传播驿站”工作坊,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113.
- [19] 施塔姆勒.正义法的理论.[M].夏彦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2.
- [20] 丁晓东.从“马法”到马克思主义之法:网络法的法理学与部门法意义[J].地方立法研究,2021(6):109-125.
- [21] 管锦绣,田辉玉.马克思技术哲学的人本主义技术观与唯物史观的技术观之整合[J].理论月刊,2010(9):12-14.
- [22] 周济南,胡梦田.数字治理从“赋权”到“平权”:数字素养培育的生成机理与实现方略[J].重庆社会科学,2025(7):80-95.
- [23] 李嘉莉.智能算法技术的意识形态风险:生成逻辑、主要表征与治理路径[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5(4):163-168.
- [24] 袁瑾.传统节气时序重构与当代公共文化生活——以江南蚕乡为中心的讨论[J].文化遗产,2021(3):24-33.

The Erosion Dilemma of Digital Capitalism on Free Time and Its Reconstruction of Justice

Wang Xiaoguang Ding Hui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0)

Abstract: The rise of digital capitalism has brought about a systematic alienation of free time. Using the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framework, this paper will deeply reveal the hidden exploitation mechanism of capital logic on free time through digital technology. Digital capitalism transforms free time into a new field of surplus value production through platform addiction mechanisms, consumption bundling strategies, and labor disguises, presenting a triple characteristic of fragmented time structure, accelerated time rhythm, and distorted time perception. Digital capitalism breaks through traditional temporal and spatial boundaries through algorithmic control, incorporating the process of labor reproduction into the value appreciation system, forming a superimposed form of absolute surplus value and relative surplus value exploitation, leading to the dual alienation of workers in terms of biological rhythms and spiritual activities. The path of liberating time sovereignty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can establish labor time regulations and algorithm transparency review at the institutional level, develop humanistic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t the technical level, and construct a value evaluation system that respects the rhythm of life at the cultural level.

Key Words: Digital Capitalism; Free Time; Time Alienation; Time Erosion